

论新时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构建

黄仁国

摘要 新时代是世界整体性加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史学主体性构建要从中国传统史学中吸取营养, 抱持开放、包容的宏大视域, 推进“一体多样”的史学形态在传承中和合式创新; 要提升中国史学的精气神, 弘扬中国史学的宏大气魄, 加强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关怀; 要超越古今中外之争, 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种优秀资源, 加强中国史学主体性中的对外公共性。

关键词 三大体系; 中国史学; 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 构建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1)09-0163-08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1.09.019

作者简介 黄仁国,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山东省中国外交遗产研究基地研究员 山东曲阜 273165

中国史学的主体性是指中国史学中的基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和史学实践而形成的主要部分^①的样态和内涵, 也包括与域外史学交流时的能动性^②。所谓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缺位, 主要指的是中国史学的自主性不彰。因此, 中国史学主体性构建问题, 讨论的是中国史学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主要样态及其基本内核的发展演进, 以及中国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处理与域外史学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也是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历史演进

中国古代史学自成体系, 主体性鲜明。近代以来, 在甲午战败前, 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非常有限, 仅流行于少数精英阶层。戊戌维新失败后, 在亡国灭种的社会背景下, 梁启超等开始激进地批判中国传统史学, 呼吁史界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兴起, 推动了西方史学的传入和中国史学的变革。其中, 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 法国史学家基佐的《欧洲文

明史》, 法国史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等论著在中国受到广泛的关注, 但其影响主要限于史学撰著形式和史学研究方法诸层面。西方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 特别是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 引起中国史家的极大兴趣。“十月革命”后, 一部分向域外学习先进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史家开始由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如, 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 都有过出国留学或游学的经历, 通过比较分析, 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民国史学的发展态势看, 西方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传统史学等长期在中国史学主体性建构中竞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 西方史学虽然对中国史学的近现代转型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但并没有在中国史学主体性建构中长期占据主导性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史学开始由民国以来的多元格局向一体格局转型, 并逐步奠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体地位, 实现了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总体上看,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体多样”

的,这种“一体多样”形态就是新中国史学主体性的表现。在建构“一体多样”史学形态中,一方面,党和政府从原则方针、机构设置、刊物建设和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全面指导;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又是在民国史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早期依托力量主要是民国史家^③,因此,新中国史学的“一体多样”形态又有学者的自主选择,体现了传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结合、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靠拢^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通过历史学学科建设、学术争论和人才培养,中国传统史学获得了新的发展,史料整理取得巨大成就;史学样态发生变化,历史理论研究取得许多重大突破;治史理念发生变化,近代史研究和基层史研究受到重视;史学研究队伍壮大,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新锐。凡此种种,中国古代史学最终由马克思主义史学来完成现代转型,无疑是历史的选择,学者的选择。

新中国有序推进针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史学交流。早期与苏联东欧史学的交流合作,对于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体形态具有重要意义。195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学者贝喜博士在中国的学术访问,直接影响了武汉大学章开沅等对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⑤在中苏史学交流中,中国史家总体上保持了较好的独立性,但中国史学受苏联史学影响很深也是不争的事实。前30年,中国史学界一方面激烈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反共反华的言论,一方面也翻译引进西方史学,中国史学发展中也出现一些与西方史学发展合辙的现象。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齐思和译美国史家鲁滨孙的《新史学》,与当时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探索具有一致性。中西史学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但以竞争为主。此外,新中国还与众多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史学交流。这些国际史学交流活动,丰富了中国史学“一体多样”的形态。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纠正史学研究中的教条化、简单化、片面化等倾向,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冷峻客观主义^⑥等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解放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如,有关世界近代史的起点问题在1979年就引起热议,世界近代史的起

点逐步提前,并越来越接近沃勒斯坦^⑦等西方学者观点。1984年黎澍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也有突破苏联史学藩篱的考量。这些史学研究的新变化大多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创新的表现,也是构建中国史学“一体多样”形态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也有“无问西东”的倾向。

苏东剧变后,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的问题意识^⑧在中国史学界造成较大影响,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勃兴,微观史学在中国成为时尚。柯林伍德等西方史家的史学理论与思想一方面导致中国史家对宏大叙事的疏离,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史学的纠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繁荣。而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客观上也给西方史学在中国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从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情况看,随着以西方经济体制和学术话语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史学对西方史学的借鉴已远远超过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甚至一些在西方不受重视抑或颇为诟病的著述在国内也曾大受追捧,出现了明显的亦步亦趋现象,而唯物史观则相对遇冷。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不少史家的担忧。如,吴英认为“观察当前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现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已经成为一种形式用语,各种西方史学思潮和方法论正在取代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即现时所谓的史学研究指导理论的多元化。”^⑨卜宪群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边缘化现象客观存在。唯物史观在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的指导作用受到削弱……盲目跟随西方话语体系,缺乏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史学研究脱离现实、回避现实而躲进象牙塔的现象也不罕见。”^⑩徐秀丽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研究中,我们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多持轻视态度,而改革开放后,有些方面又矫枉过正,出现了主体性缺位的问题。”^⑪

近几年来,西方体制的弊端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社会领域中都凸显出来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经济文化

优势则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民众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新气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史学主体性逐渐受到史学界重视。因此,21世纪初出现的比较明显的主体性缺位的时期并不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史学主体性,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也是“排除西方史学的不良影响”^⑩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史学主体性的表征与内涵

《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强调学习、实践、开放、包容。中国史学的主体性构建中也秉承着这种文化传统。孔子饱读诗书,周游列国,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孔子整理的《诗经》《尚书》与编修的《春秋》等典籍看,孔子虽为鲁国人,但具有开阔的视域。纵向上,孔子对夏商周以来的中华文明都有整理;横向上,其《春秋》虽为鲁国春秋,但并不只录鲁国一国史事,而是以鲁国君主为线索,兼及他国史事,至少是涵盖当时的华夏。春秋时很多诸侯国修过史,《墨子·明鬼》中载有墨子语“吾见百国春秋”,但流传下来的很少,其中具体原因已很难考证。鲁国《春秋》得以传承,与孔子的视域深远宽阔有关。开放、包容的宏大视域是中国史学主体性的一个鲜明特征。该特征蕴含着朴素的“中华一体”的思想。

《尚书·禹贡》述及上古中国“五服制”后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描述上古文化在域内外广泛传播的景象。秦汉以降,中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境内互联互通,文明相生相成,共同发展,主体性增强。通过不断发展的朝贡体系以及时通时绝的丝绸之路,中华文明向域外圈层递减式辐射,并主动吸纳境外文明。古代中国王朝更迭,有统有分,疆域也时有变动,但史学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史记》开启中国通史先例,《汉书》之后各断代史相继,三国、南北朝、五代、宋辽金等政权均有正史相传,职业史官修史一直占据古代史学中的显赫地位。

正史之外,《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文史通义》等巨著,各种地方史、风俗史、文献史,野史、演义等通俗史学读物,以及各朝档案文书,共同构建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性、多样性等相统一的相对完备的独特体系。可见,古代中国史学已经形成“一体多样”的形态。这种比较稳定和具有连续性的形态是中国特有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史学撰述组织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史学发展繁荣的重要保障。

中国古代史学“一体多样”形态或表征具有深刻的内涵,这可以通过中西古代史学、地缘情势、价值关怀等方面的比较略知一二。

中国古代史学讲究传承与创新。孔子修春秋,将历史以周天子权威是否式微即“礼乐征伐是否自天子出”为界划分为有道与无道两个时代,而周天子权威式微后又划分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三个不同的阶段。这是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主张从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关系中总结历史经验。这种连续性,也如孔子所处时代各诸侯国政治上认同的“尊王攘夷”思想一样,体现的是一种主体性回归。比孔子稍晚的修昔底德则强调“人性总是人性”,主张从不变的人性中总结历史经验。而且,修昔底德对待雅典和斯巴达都保持着严格冷峻的客观主义,没有中国大一统的主体性观念。这或许与欧洲文明发展中的断裂性有关,也与对未来的走向判断不明有关。修昔底德的治史理念,对欧洲乃至后来西方史学的多样性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刘家和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通史精神,而欧洲传统史学大多缺乏通史精神。^⑪在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联系的认识上,中西史学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地缘具有内循环的优势,能够长期保持自给自足,对域外敏感性不高,而且在农耕文明时代长期保持区域大国的地位,经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同时,大多数时候也不排斥或多或少的外循环。因此,中国文化强调“以我为主”的和合式创新。欧洲虽然也有过统一,但长期保持着一种与其地缘相适应的多强并立态势。因此,欧洲文化强调

在竞争中创新。中西地缘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确实有特色之别。这种相区别的特色自然也反映在史学发展之中。如,《诗经》和《荷马史诗》中都有战争场景,都有尚武精神,但《诗经》多宣扬保家卫国的大义,描述军队的盛大气势,没有暴力、血腥的文字;而《荷马史诗》则多处揭示战争的惨烈景象。又如,中西史学都在创新中发展,但中国史学偏好因袭,20世纪之前各史学流派之间融通多而分歧少,“择其善者而从之”现象明显,主体性贯穿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之中;而西方史学偏好否定,各流派之间对垒分明,“领一时之风骚”现象明显,分散性贯穿在纵横主线中。

从价值关怀看,古代中国向来讲道统,“以德治国”风行,道德学问最高的人在易卦中居“上九”位,高于“九五至尊”的帝王,即道德与实力不是成正比的动态关系,在大多数时候游离于实力之外。道德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强调主体性、连续性,也兼顾普适性和包容性。古代中国帝王,不管来自东南西北,无不强调道德的传承。欧洲在公元纪年后宗教盛行,宗教具有内部公共性和外部排他性,而排他性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欧洲及西方后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所论中国古代的差序格局和西方的团体格局^⑭的文化差异,从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中也有反映。欧洲中世纪史学宗教化,古希腊史家的理性传统被抛弃,这是后来兰克史学兴盛的重要历史原因。但是,兰克史学的勃兴及之后西方史学的发展,没有改变西方内部公共性和外部排他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如,“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单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单元”这种偏见迄今仍在西方颇为流行。^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反映在史学样态上就是“一体多样”和“多样一体”。不少中国学者只关注中西史学的同源性和“殊途同归”现象,却选择性忽视中西史学的本质区别,即中国史学强调指导思想的“一体”,而西方史学强调指导思想的“多样”。

通史精神、和合式创新、崇德求同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根”和“魂”。“无问西东”,有可能会导导致解构中国史学两千多年来的“一体多样”形

态,或使中国史学丧失主体性。

三、新时代构建中国史学主体性的任务

中国史学开启现代转型进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体现为中国向域外学习,即学习和借鉴域外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将它们中国化。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长期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这两种范式都不是中国史家原创,也不能反映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整体情况,却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话语。当然,不能否定这种范式之争的学术意义,它确实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但也隐含着原创性缺失的问题。

近几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首先,世界格局发生了质变。近代以来,西欧曾以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长期强制性地引领世界发展,世界加速由分散走向整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西欧中心地位下降,非西方发展模式开始与西方模式竞争,但西方中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世界整体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全球化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手中。苏东剧变后,西方模式、西方道路曾一度被神化。但近几年来,西方势力的颓势已现,而非西方势力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次,随着世界格局的质变,西方制度体系、价值体系、话语体系等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新旧力量的竞争显性化,全球化与地方化共同发展,作为全球化反思和修正的地方化发展趋势加快。第三,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的整体性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增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国际社会行为体参与。总体上看,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加强了,而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同时增加。

显然,新时代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史学界作出相应的变革。这种变革必须是适应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如,全球史、极简史等的勃兴,就是对微观史学泛滥的一种纠偏。在微观史学发展

的基础上推动宏大叙事的发展,既是史学发展的学术必然,也是探寻世界整体性发展规律的现实需要;同时,它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契合。

中国历史文化向来具有大气魄。《易·系辞上》以“弥纶天地之道”为己任,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原始反终”“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等。这些话语虽然极具理想化色彩,但确实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也具有一些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⑩。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思考,《易经》已经提出了一种朴素的整体运动观。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是主张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从历史理论的角度看,是重视历史理论的,主张加强历史理论研究,并主张通过历史理论研究展望未来。《荀子·解蔽》开篇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讲的也是要克服偏见,重视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究。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是明确将宏大叙事与独立思考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史学的标志性话语,也是中国史学长期保持“一体多样”形态的史学思想根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称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反映的也是一种史家必须具备悠远博厚根基并着力于历史理论研究的史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思想与唯物史观也是相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界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刻阐释人类社会演进规律,充分发挥史家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史家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即必须力争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与柯林伍德所谓“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具有历史”^⑪的观念形态的史学具有本质的区别,也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

202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

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⑫因此,站在推动全球史学发展的高度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回顾既往中国史学的研究,从中提炼具有中国精气神的术语,通过平等对话与交流,将这些术语转化为域外能够听得懂的话语,为全球史学研究的发展增添新内容,应该是今后构建中国史学主体性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还需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手段,需要有大量不同学术背景的史家积极参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需要史家秉持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关怀。中国古代史家具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具有鲜明的价值关怀。这种将学术关怀与价值关怀相统一的思想在新中国史学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的史论中也都有比较鲜明的体现。2020年6月,张海鹏为其7卷本文集写“卷前赘语”时说“每提笔或敲打键盘,都想到要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前人负责,对后人负责。”^⑬体现的也是学术关怀与价值关怀的统一。实事求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不管使用什么方法研究历史,离开了实事求是,都不是科学的史学研究,这在古今中外严谨的史家中不存在分歧,即便有分歧也仅存于对史实真实性的认定方法上。但是,史家是否需要有价值关怀却是有争议的。20世纪以来,受某些西方史学思潮影响,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开始在中国一些史家中萌生并成为一些史家的座右铭。在一些学者看来,唯有彻底摆脱感情羁绊,毫无价值预设,历史研究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间,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被作为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这种思想又有所抬头,在21世纪初十多年间则颇为弥漫,其中比较极端的表现是拒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事实上,史学撰述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严格地说,是不存在没有价值关怀的史学作品的,区别只是撰述者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在其作品中怎样体现其价值观。所谓中国史学的精气神,其中也包含史家的现实关怀、家国情怀和天下观等。马克思主义

以人类社会整体发展为价值关怀,符合当下世界整体性增强的时代特点。当下中国正在逐渐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史学研究应该要具备更为开阔的视域,加强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关怀。这是中国史学主体性构建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否则中国史学很可能会在国际史学主流中被边缘化。

四、新时代构建中国史学主体性的方法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应对史学危机的时候,就有“回到乾嘉”的呼声,也有稍晚些的全盘西化舆论。这说明,在构建中国史学的主体性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经过争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升华,也吸纳了西方史学中的合理成分,决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走偏离中国主体性的完全西化道路。但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强调从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中寻找主体性依据的呼声抬头。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学术与国际接轨的深化,强调要从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发展史中辨别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呼声也有高涨之势。这里就涉及古今之争和中外之争。

构建中国史学主体性,不要把古今、中外视为非此即彼、二元对决的两个方面。这既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特色是融通,即通过具有主体性的交融而达到通达的境界。这种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上的融通是中国史学呈现出多源一统、一体多样的形态并历久不衰的密码。首先,习近平自2016年以来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系列讲话、贺信等中就蕴含着融通的重要思想。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②0}其次,融通是中国历史演

进的主流。近几年来,考古学家苏秉琦的“满天星斗”^{②1}和哲学家赵汀阳的“漩涡模式”^{②2}颇受学界关注。“满天星斗”揭示的是中国上古时期多个文明中心共存的现象,“漩涡模式”揭示的是中国古代周边多种文明向中心交汇的现象。由“满天星斗”到“漩涡模式”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文化进程,这一进程因融通而得以实现和丰富,即由“满天星斗”走向“中华一体”并在一体中吸纳和包容多样。与中国作为区域大国相适应的“漩涡模式”已经成为历史。与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相适应的新一轮融通在近代以来便已展开,中国被迫卷入这轮融通,走的是由“沉沦”到“上升”的发展道路。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又展现出新的特点,即由中国的差序格局、西方的团体格局等向新的共同体格局推进。纵观中国历史,尽管有时候内敛性明显些,有时候开放性明显些,但融通一直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主流,这与中国悠久的大国地位有关,与中国内部长期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多样性有关。再次,融通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品格。这种独特的文化品格与中国海陆双栖以及以中原为中心联通周边高山、高原、沙漠、草原、大海等的独特地缘结构相一致。钱穆将此品格喻为“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②3}。中医、太极、儒释道三教合一等,都是融通文化的典型。如,中医学强调阴阳交感、互根互用、对立制约、消长平衡、相互转化等融通观念,重视客体内部的关联性,讲究治疗的综合性、联动性。这些,体现的都是一种复杂的多元动态平衡。《易·系辞上》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讲的就是在动态中考察融通的情势。最后,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史学交流也秉持了融通理念。

2019年习近平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②4}这表明,按照融通古今中外优秀资源的方法论构建

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首先,要打破历史学内部各学科之间自设的壁垒,通过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不同学科和研究方向之间的横向协作,丰富各学科的内涵,赋予各学科具体内容的定位以更多的参照物。其次,要引入历史学学科之外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有助于推进史学研究的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加强以历史学为主的跨学科研究。第三,要改变各学科内部古代、近代、现代等不同时段“隔行如隔山”的状态,大力培育通史性的人才。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中考察,辨析史学研究中的冷门、冷门等薄弱环节,查漏补缺,加强对历史整体性的研究,加强对历史理论的研究。

融通古今中外的史学资源,还要特别注意中国史学的公共性问题。主体性与公共性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中国史学“一体多样”形态中的“一体”,既是中国史学的主体性,也是中国史学的内部公共性。公共性还有对外的一面,即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相通、超越民族性和地域性,这也是主体性的延伸。这种对外的公共性,是在对外史学交流中形成的,或者代表史学主体性的域外影响力,体现主体性的外溢;或者代表域外史学对其主体性的影响,体现主体性的包容和延展。不同国家的史学主体性中的对外公共性是不一样的,有些外溢性多些,有些包容性多些,而且不同时期也会有变化。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热衷于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越南^⑤、印度尼西亚^⑥等周边国家史家也掀起对其本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热潮,而同期欧美国家的一些史家则对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表示不理解,认为如此细分没有多大意义^⑦。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家对于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热情有所削减,分歧仍有,甚至不弱于新中国建国初期,但百花齐放多,百家争鸣少。

如前所述,21世纪初期,西方史学在中国受到极大重视,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有关。所谓中国史学中的主体性缺失,反映的是中国史家积极主动向西方学习的一面,而且这种学习过程迄今尚未结束。西方史学作为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具有较强的对外公共性的。问题是,西方史学的对外公共性

是历史的,而且其早期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如何剔除其历史性和区域性而择取其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公共性是需要具体分析。同样,中国传统史学也具有明显的历史性与区域性。复兴中国传统史学,不应该是简单的传承与转化,而应该是立足于新时代进行全新的重构与再造。这同样需要辨识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现代过程中的变化与新创,同时关注全球史学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此外,还要加强比较史学的研究,正如美国史家恩斯特·布赖萨赫所说“探讨未来人类社会的共通性的比较史学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如何在变迁(外在环境不断变化的结果)和延续(试图确保长久的稳定状态)之间实现平衡,这个长期困扰人类的问题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⑧开展“探讨未来人类社会的共通性的比较史学”研究,一方面要摈弃那些已被证明不再具备公共性特质的陈腐落后的史学理论、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还要发现并吸纳更多显性的和潜在的具有公共性价值的新理论、思想和方法。这就需要深入中西史学各自发展进程中,发现那些被遮蔽或者扭曲的具有公共性的内容;要超越中西史学,发现中西史学之外的公共性,特别是那些新兴力量中的具备潜在公共性的或者长期被忽视而又具有生命力的史学形态与内质,或者说,需要对更多国家的史学研究进行分析并由此辨识和提炼各种新的公共性。即在超越古今中外之争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反思、补缺和新创,构建中国史学主体性。

注:

- ①《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主体”的释义第一个是“事物的主要部分”,其他还有“哲学上指有认识 and 实践能力的人”“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01页。
- ②《辞海》对“主体性”的释义强调“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认为“其核心是人的能动性问题”。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6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8页。
- ③赵庆云《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9页。
- ④李红岩《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 ⑤《1954年：我校辛亥革命研究的发端》，《华中师大报》2011年9月20日。
- ⑥⑬刘家和《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284、189页。
- ⑦沃勒斯坦认为“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一个我们可称其为欧洲世界体系的格局宣告形成。”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 ⑧⑰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扬·冯·德·杜森编，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8—399、300页。
- ⑨S. H. 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383页。
- ⑩⑪卜宪群《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44、414页。
- ⑫张顺洪《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方向问题》，《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 ⑬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4页。
- ⑭罗宾·W. 温克、L. P. 汪德尔《牛津欧洲史》第1卷，吴舒屏、张良福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3页。
- ⑮刘大年《刘大年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25页。
- 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 ⑰张海鹏《张海鹏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卷前赘语，第3页。
- ⑱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38—339页。
- ⑲有关“满天星斗”的论述，参见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 ⑳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154页。
- ㉑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引论，第14页。
- ㉒《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 ㉓陈玉龙《迈进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科学》，《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 ㉔荒村《印度尼西亚历史问题研究会议的召开》，《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 ㉕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 ㉖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三版），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66页。

（责任编辑：丁 远）

On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Huang Renguo

Abstract: The new era is an era of global accel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s subjectivity should absorb nutrition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hold an open and inclusive vision, and promote the concordance and combined innovation in inheritance of "integrated and diverse" historiography forms. We should enhance the spiri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rry forward the grand verve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strengthen the value concer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human society. We should transcend the argumen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at home and abroad, integrate all kinds of excellent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in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three major system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ubjectivity; Marxism; construction